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合理价值取向研究^{*}

柯 平 邹金汇 李梦玲 胡银霞

摘 要 价值取向内化于所有政策之中。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政策的合法性与公共性,从不同价值取向变迁历程、文化自觉等视角解读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均等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合理化价值选择,在这一合理价值影响下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要条件。参考文献 26。

关键词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 公共文化政策 价值取向

Study on the Reasonable Value Orientation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qualization

Ke Ping Zou Jinhui Li Mengling Hu Yinxia

Abstract: Value orientation lies in all polic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itimacy and publicity of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and interprets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values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Then it proposes that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 is a reasonable choice in the equalized policies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stresses the necessity of taking the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under reasonable influence as a precond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ystem. 26 refs.

Keywords: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qualization; Public Cultural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清晰地界定研究对象是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1]。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基于公共利益,通过动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来提供各种所需的物品(有形物品和无形物品)的活动^[2]。在本研究中,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建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共识基础上,由政府根据现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来提供,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了公共价值中最基本的部分,满足了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因而与公民文化生活权益密切相关。在公共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性质、受益范围的大小以及迫切程度等来确定供给次序^[3]。在我国当前现实生活中,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存在明显的差异性^[4],均等化作为弥合差异的重要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但目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多是从内涵与分类、制度因素、空间差异等视角展开^[5]。基于此,本文通过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视角来解读公共文化政策,讨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构建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合理性。

1 公共政策——公共权力的表达方式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任务,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点,“文化自信”被纳入“三个自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为国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A050)研究成果之一。

家战略。近年的“两会”,在文化体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文化立法、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深入的战略部署,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等亦不断出台实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作为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要条件,逐渐成为公共政策落实的重点。

政治价值取向内在于所有政策之中,政策的相关决议明显影响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价值观^{[6] (64)}。一项公共政策经由政府制定而出台,是综合考虑了社会发展实际与公民接受程度的伦理价值选择。公共政策天然地要通过公共性与合法性这两大属性得以评价:公共性是其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根本属性^[7];合法性则是来自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政策之所以能成为政策的根源,来自于公民的自愿服从,即公共政策需要评估社会公众固有的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进而判断政策实现的可能。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作为理性人,公民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公众通过让渡一部分私权利,组成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组成国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权力,进而使公民在遇到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8]。公共管理领域有学者用政府、市场、市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划分国家的社会结构,也有学者将公共领域划分为国家、政府、社会^[9]。这多是以社会生活参与中的公共性与私人性质为限。

公私之分为诸多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私人与公共的协同相关,还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公共行为的“异化”。结合近代社会契约论,都适用“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10]的政府来平衡。作为国家的具象化与执行主体,政府通过推行政策来实现其代表的公众让渡出的共同意志。为克制政府主体利己而非代表共同意志的行为,在政策的制定设计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其受制于某一利益阶层的控制,更要考量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因此,作为公共权力的核心表达方

式,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合理化的价值取向来明确其意义。

2 价值选择——公共文化政策的本质

公共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界定是否精准、科学、合理,是政策制定与合理实施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公共性、民主性取向源自我国政治制度本身的根本要求,但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特定的社会问题,因而需要将公共文化政策通过议程设置这一方法推动落实,通过公共文化政策的落实实现公共利益,解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具体问题。

2.1 公共文化政策中的“公共”选择

公共道德是为范围更广泛的全体居民服务,而不是为自我、家庭、小团体或某些人的利益服务^{[6] (11)}。公共道德通过公共政策来传递与塑造,但由于受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及各社会阶层资源占用情况的不平衡,强势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强势阶层更容易接触到社会权利中心,拥有更多的表达通道与话语权。因此,在公共文化政策制定时需充分考虑距离权力中心更远的弱势群体的权益,让弱势群体的诉求可以进入政策制定议程之中。

公共文化政策中的公共性、合法性可以通过其科学性和有效性来评价,但最终要通过广大公众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认可与支持来具体实现。公共文化政策的合法性可以通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能感来衡量,在保证主体平等、程序民主的前提下,公共文化政策的合法性是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本身的合理化认识。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因果共生,在公共文化政策中通过问题界定、价值取向、政策实施效果展现出来。

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被视为界定公共服务的两大标准,但“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指涉的对象却不如其“排除的内容”那般清晰。由此而衍生出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也有着多种不同的范围界定,事实上理论与现实中都不存在一个完

全独立客观的能够分清公共服务界限的分类标准。毕竟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正是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公私权限的调整来完成了政治的进步。具体到公共文化政策,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并不需要完全照搬经济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教育、医疗、文化服务作为传统意义上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都以多种形式与市场相结合,但同时又存在着无可避免的公共性。同时,市场也可以有效地提供高效的服务,如天气预报、海上灯塔等都曾主要由私人(市场)来提供服务。

那么,公共文化政策应该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如何分工?政府拥有强大的公共资源调配能力,可以提供几乎所有的服务,如何界定“公共”更需要考虑其背后的价值选择。普遍性原则(Principle of Generality)是一个主流思想,即政府同一地提供给所有公民,不论是否符合非排他性条件^[11]。由前述社会契约理论出发,从政治程序、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可以认为公共文化政策是一种政治议程设置过程,是对公众关注公共问题的价值预判,也是对公众价值取向的理解与影响。通过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各阶层平等与程序民主,真正推动社会价值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这期间存在一个元问题,即“公共”“私人”的群己界限^[12],如何确定自由与权利的边界,怎样面对森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最小自由原则和弱帕累托标准存在冲突^[13],即福利经济学中最常考虑的效率最大化与社会实际效能的冲突。由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无法明确具体的收益对象,因而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是公共议题,如果可以明确具体的收益对象,则应考虑本着“谁付费谁收益”的原则推进市场服务与价值判断。

从政策议程设置的程序公正角度来审视,合理化的价值取向可以理解为某种合理的价值偏好,这种价值选择界定了权利边界,解释个人自由和组织权利的边界,这种由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就是目前社会进程的偏好。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理

解公共文化政策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对分析我国当前建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2 公共文化政策价值取向变迁

古典功利主义用“趋利避害”表述人性,并据此构建起理论^[14],受其指导下的政府公共政策以谋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公共文化政策更多地呈现出重视结果、强调经济效率的属性,且政策更看中短期执行效果。政府决策与执行的基本依据都是政策的效果或效率,更为看重的是决策结果的损益值,但却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容易导致公共文化政策过于侧重效率的简单重复。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缺陷是明显的,无法解决“最大多数人”“最少受惠者”在不同角度带来的概念模糊性^[15],因而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权益,不能解决公平分配问题,这一决策价值导向已无法适用于当代社会。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16]:如果正义政策被取消,那么社会的最不利阶层的生活就会更差。这些政策即使不是完全正义的,也是始终正义的,“一人享受过多,另一人享受过少是产生犯罪的根源”^[17],公平、正义与社会福祉密切相关。这种“正义政策”建立在平等自由、差别原则及机会的公正平等正义原则上。

公共利益是由公众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表现出来的利益,是社会公众所必需的、个人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因而公共文化政策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共利益而作,体现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的伦理诉求,由此公共利益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政策价值取向的精神基石。公共文化政策价值取向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导向,要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短期的功利增长,应适当向社会少数与弱势群体倾斜,要保障社会少数与弱势群体最基本的文化权益。

美国没有专职的文化主管部门,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私有化、市场化是其主要文化路线,多元的市场、高效竞争的私营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

空前的文化输出,而且削减了大量美国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开支,并通过这样的文化裹挟着经济、改变人们的观念——将“公共物品”和“集体”等概念转化为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个人责任”价值观。不同于美国,一直以来,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以文化发展水平的保存延续而闻名于世,政府文化开支常常相当于 GNP 的一半,大型公共文化项目坚持政府参与的混合经济^[18],这也受欧洲多元的价值取向影响,对绝对的资本主义会造就同构的、以公司为主导的社会始终保持警惕。总体来看,欧洲公共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坚持保障个人与社会的选择权益,尽可能地减少资本对公共事务的运作控制。

3 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取向

政策是政府的价值导向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8 年召开“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时提出:“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19],文化政策反映着一个国家对于社会发展的深层认识。出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效率优先的政策取向反映出我国改革前期的深层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这种功利主义主导的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及其带来的飞速的经济发展,也付出了社会不公平现象等代价。想要矫正这些发展的代价,需要有效的公共文化政策,更需要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来提高全民素养、增强公民意识。

3.1 融合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政策是价值取向的反映,也深刻地塑造着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源自文化、历史、经济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总结为“文化自觉”。延续前文讨论,政策作为价值取向的反映也将继续影响价值,民族文化本身影响文化政策的制定,而后文化政策也将影响其民族文化。价值取向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自觉作为道德原则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下,道德原则深入我们的文明血脉。政府行为及其政策

正是这些因素叠加下的产物,即功利主义也一定程度上受到道德原则的制约。包容、兼收并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映出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公平、均衡、融合发展的文化自觉,致力于全民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间,政府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功利主义的效率优势。

以农家书屋建设为例,2005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做出了“送书下乡”与“电影放映工程”建设的指示。在该纲要的指导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建立农家书屋,旨在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2007 年,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至 2012 年,全国农家书屋工程竣工,农家书屋已覆盖全国具备条件的行政村,提前三年完成了“农家书屋村村有”的任务。全国共建成达到统一规定标准的农家书屋 600,449 家,投入资金 180 多亿元,共计配送图书 9.4 亿册、报刊 5.4 亿份、音像制品 1.2 亿张、影视放映设备和阅读设施 60 多万套^[20]。十余年来,农家书屋从无到有,其藏书量甚至已经超过全国公共图书馆 8.38 亿册的馆藏总量(2015 年)^[21]。在大幅度提升人均图书拥有量的同时,农家书屋的后续发展问题也颇受关注。在我们对山东(2015 年)、福建(2016 年)等地农家书屋的调查发现,农家书屋将数以亿计的书刊派发到乡村,增加了设施设备,改变了广大乡村“无书刊可读”的局面,在促进乡村“书香”文化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农家书屋的图书配置和管理存在着许多问题,配置的书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与媒体上所宣传的农家书屋取得的巨大成效有着较大的反差。前期工程项目更多地侧重硬件建设与投入而轻软件建设与利用,忽视农村基本文化需求和服务的针对性,可以说是依托于功

利性的政策价值取向的结果。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我国政府开始注重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2014年,江苏省文化厅发出《关于开展农家书屋纳入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农家书屋划入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要求,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加强对农家书屋的统筹管理,实现农村、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201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整合农家书屋资源,设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层服务点,纳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和使用。2016年12月,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五部委正式发布的《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符合条件的农家书屋成为图书馆分馆。这些从服务效能角度重新整合公共文化资源的政策,融合基层文化服务的同时彰显出不同的发展侧重点,正是我国公共文化政策从功利主义向公共利益转型的体现。

3.2 兼顾效率的均等价值导向

公共文化政策涉及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基本范畴是“公共”的价值问题,政策制定所需考量的更多是公共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这就要求政策不能再遵循“功利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目的论理论,即公共文化政策需要更多地考虑对公共行为的道德,及其对公共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就是通过公共文化政策传递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过分看重总量,不论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总量还是投入产出总量,但总量不能代表每个人获得的均等收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能以一部分人的获益增加来判断其正当

性。虽然现实中“大多数人”或“整体”常用来代表正义,掩盖了另一部分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也是正当的,即使是少数人。信奉功利主义的效果论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入计算总量的循环中,在承认功利主义带来的巨大效率之外,如今我们更要关注这一过程中被忽视的公共性与平等性等公共文化政策的根本属性。

我国的公共文化政策在公共性、平等性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偏离。有研究认为,政策参与者之间能否取得共识是我国政策出台的重要前提,当前达成政策共识的方式主要是折中而非择优^[22]。客观地梳理现存问题,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功利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政府行为的最高目标是效率。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这一选择无可厚非,正是这种选择促进了社会短时期内产生巨大进步,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物质资源。但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矛盾转向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时,效率优先价值取向主导下的政府政策将不再适用。

具体分析公共文化政策在公共性、平等性有所偏离的原因,主要是主体。公共文化政策公共性的前提是公众参与,进而才能保证主体平等和程序正义。虽然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政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如听证会逐步成为重要信息来源和决策依据,但目前报道出的听证会的公众代表阶层与价值表达还存在不平等。具体到一项公共文化政策,人与人之间的文化需求与理解差距非常大,目前的听证会很少能到达最底层——资源最少、最需要被关注的弱势群体。考虑到各级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全国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全国统筹,减少地方分级财政压力带来的不均衡,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地方性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作为补充。

3.3 以人为本——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取向

正义理论家罗尔斯提出:“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一样有权要求在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权利和

自由体系内获得相同的权利;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23]政府行为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因为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威能够强有力地推动政策落实,进而比个人或其他团体更有效地实现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以人为本”不是抽象地强调个体,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我们讨论的“人”应是所有的人,不是以孤立的“个人”为本,而应以人民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的利益是十分具体的,因此必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实现社会和谐,均等地服务于每一位公民的核心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外来人口密集的城乡结合部还是留守儿童与老人占多数的农业村,长远发展的基石是公众文化素养的提升。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明显的当前,这一过程最需要公共文化的支持,以保障公共文化覆盖底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正是侧重于解决这一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 100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底的 10.2% 下降到 2016 年底的 4.5%^[25]。整体来看,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多种建设性导向政策,强力推进了文化建设中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社会发展。随着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及《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 年)》的发布,以贫困地区为突破口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加快开展,“各地要根据《意见》精神,深入分析本地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策划实施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规划和项目”^[26],这反映出从追求总量转向地区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同时由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本身带有异质属性,有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边际成本高,有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流动性强,并非简单地统一标准就可以服务于所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发展。鉴于此,可以根据不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性质区分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最适宜的配套措施,从而促进公共服务体系化发展;如中央政府在低流动性、高边际成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承担更大份额的支出责任,如高级文化人才培养、文化艺术研究单位的扶持等,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低流动性的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的责任。从对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看,政府的政策一方面需要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减轻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破除政府政策本身的制度障碍,意识到“非排他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之中,从而认识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必然性。

4 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其关注公平、正义,协调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价值成为政界、学界的研究切入点。通过前述对不同价值取向的解析,分析不同价值取向对公共文化政策的影响,进而观察均等化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合理化价值选择,及其在合理价值影响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作为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条件的必要性。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均等化落实“公共”权益,通过这一传承自民族文化自觉的合理价值取向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建立多元、开放的文化建设理念。通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引导丰富文化制度,形成可持续的发展体系。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层面出发,依章建立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管理机制,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规范管理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营造更好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公平意识中培育公民精神,保障公共文化健康发展,通过多样的公共文化形式,顺应公共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多元价值取向,不断提升公共文

化活动的层次和水平,实现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9.
- 刘德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基于服务型政府的分析视角[J].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6.
- 王海龙.公共服务的分类框架:反思与重构[J].东南学术,2008(6):48-58.
- 王洛忠,李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构建与地区差距测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184-195.
- 叶林,等.城市扩张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困境:基于广州市的实证分析[J].学术研究,2016(2):68-74.
- Terry L Cooper.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M].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1994.
- 靳媛媛.论“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取向——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语境下的考量[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1(1):27-31.
-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王涛,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60.
- 张刚.现代公共管理教程基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3.
-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05.
- (美)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M].张定淮,何志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 苏振华,赵鼎新.重新思考群己权界: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考辨[J].社会学研究,2012(3):48-65,243.
- Sen A.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Repl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1, 79(6):1406-1407.
- 万斌,顾金喜.功利主义与公共政策伦理:如何从冲突走向和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12-19.
- 郭夏娟.“最大多数人”与“最少受惠者”——两种正义观的伦理基础及其模糊性[J].学术月刊,2011(10):51-58.
-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08.
-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
- 马湘临.扶持还是放任——欧美公共文化政策比较[J].社会观察,2004(7):10-11.
- 滕珺.理想、困境与新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六十年的发展演变[J].教育学报,2011(2):28-39.
- 周文超.农家书屋工程提前三年完成建设 60 万书屋覆盖全国行政村[N/OL].[2017-09-07].
http://china.cnr.cn/gdgg/201209/t20120927_511010132.shtml.
-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年鉴 2016 [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424.
- 陈玲,等.择优还是折中?——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解释框架[J].管理世界,2010(8):59-72.
-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60.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 顾仲阳.扶贫精准有力 减贫提质加速[N].人民日报,2017-07-13(09).
- 刘婵.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N].中国文化报,2015-02-12(01).

(柯平 教授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邹金汇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 2015 级博士研究生, 李梦玲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图书情报 2016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 胡银霞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09-09